

〈研究ノート〉

论皇太极“伐大树”军事思想及实践

黄 韶 海

摘要：天聪初年，后金被明朝及其同盟三面包围，面临立国以来最严峻的外部形势。为了应对危机，皇太极在充分认识到敌我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形成了“伐大树”军事思想，将之作为后金与明朝大国争锋的指导性战略。所谓“伐大树”，意为徐图渐进，通过削弱强敌和加强自身的方式，缩小两者差距，最终实现弱势一方获取胜利。历史证明，皇太极的“伐大树”思想值得予以关注，在其指导下，清（后金）政权开展了征伐朝鲜、攻取皮岛、统一漠南蒙古、袭扰关内等军事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明清易代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伐大树”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反映了清（后金）统治者政治抱负和观念的转变，即由努尔哈赤时期的“居辽河之东”转变为皇太极时期的“欲得中原”。

关键词：皇太极；“伐大树”；军事思想；明清易代

皇太極「伐大樹」の軍事思想及び実践について

要旨：天聰初年、後金は、明とその同盟から三つの方向を包圍され、立国以来最も厳しい形勢に直面した。ホンタイジは、危機に対処するため、敵味方の差が大きいことを十分に認識し、「伐大樹」という軍事思想を掲げ、明という大国と戦うための指導的戦略とした。所謂「伐大樹」は、強敵を

弱体化させ、味方を強化することで、両者の差を縮めるという意味であり、最終的には弱い方の勝利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ある。ホンタイジの「伐大樹」思想は、歴史的に証明され、注目されてきた。その指導のもとで、清（後金）政権は、朝鮮征伐、皮島攻略、漠南モンゴルの統一、関内襲撃などの軍事行動に於いて、重要な影響を及ぼし、明清易代の進行にも推進作用を果たした。「伐大樹」という軍事思想の形成と発展は、本質的に清（後金）の支配者の政治的抱負と観念の転換を反映していた。即ちヌルハチ時代の「居遼河之東」よりホンタイジ時代の「欲得中原」に変わった。

キーワード：ホンタイジ、「伐大樹」、軍事思想、明清易代

清太宗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在他执政期间，对明朝的军事行动贯穿始终，为清王朝最终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皇太极生前，曾就与明争战问题作过一番精彩的表述：“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¹这段文字生动通俗，却反映了皇太极与明朝大国争锋的军事思想，成为了明清易代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体现了皇太极的智慧。然而，学界一般都将其用来解释皇太极五入中原的原因和目的，却未能从宏观角度审视这一思想的内涵。²

1 《清太宗实录》卷62“崇德七年九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853页。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太宗实录》顺治初纂小红绫本（文献编号：103000175）第39册，卷62“崇德七年九月初五日”条，其文为“北京如大树，不先斫其两旁，何能预仆……况明朝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掠，待彼兵日衰，我兵力日强，北京可不劳而得矣。”与中华书局本大意相同。谨致谢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蔡名哲先生提供此条史料。

2 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成果，参见李治亭：《论清（后金）五次入关及其战略目标》，《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83年增刊第1期。该文第四节“清（后金）入关征明的战略意义”具体介绍了皇太极的“伐大树”军事思想，但却仅仅将其作为清（后金）军五入中原的原因和目的进行分析。此外，有关皇太极的军事实践，亦有一批论文加以考察。参见刘建新、刘景宪、郭成康：《一六三七年明清皮岛之战》，《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徐凯：《论“丁卯虏乱”与“丙子胡乱”——兼评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的战略》，

首先，通过史实可知，皇太极的“伐大树”军事思想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征伐朝鲜、攻取皮岛、统一漠南蒙古、袭扰关内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具体军事行动；其次，“伐大树”军事思想的实践对明清易代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将其放到明清鼎革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讨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三，“伐大树”军事思想的背后体现的是清（后金）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即由努尔哈赤时期的割据辽东称雄，转变为皇太极的意图进取中原。上述三点，以往学界或有所忽略，或阐释较少。由此可见，探讨“伐大树”的宏观军事思想，以及在其指导下进行的军事行动，对于深化皇太极、明清战争史乃至明清易代大变局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伐大树”军事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地处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在基本统一女真各部之后，即位称汗，改元天命，创建后金政权，与明朝分庭抗礼。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攻克抚顺、清河两座辽东边镇，正式拉开了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在其后的几年内，后金势力发展迅猛，接连取得萨尔浒大战、开原铁岭之战、辽沈大战的胜利，取代明朝，成为辽东平原新的主人。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率八旗铁骑渡过辽河，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不战而降。在连年征战中，后金军高奏凯歌，而明朝却丢城失地，在广宁之战后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山海关危如累卵，北京受到八旗兵直接的军事威胁。

然而，好景不长，待到皇太极继位，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后金面临立国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内部而言，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³，造成了辽东地区严重的社会危机，新生的后金政权

《当代韩国》1994年第3期；关树东《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政策和措施》，《满族研究》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主要是个案分析，以叙述为主，缺乏对皇太极时期军事行动的宏观论证。

3 《清太宗实录》卷64“崇德八年正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881页。

陷于动荡之中，急需改变策略，巩固内政。⁴就外部而言，此时的后金遭遇包围态势，国家陷入东、西、南三面受敌的窘境。

1. 东面危机

后金的东面是明朝的重要藩属朝鲜。李氏朝鲜自立国以来，便奉明朝为宗主国，双方关系十分亲密。⁵而对于邻近的女真族，朝鲜则深受儒家“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从心理上充满了蔑视。因此，努尔哈赤势力兴起后，朝鲜便在明朝的要求下与之结成同盟，共同打击后金政权。萨尔浒之战中，朝鲜国王李瑋曾派出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统领三营兵马13000余人渡过鸭绿江，被编入总兵刘綎所率东路军。随着明朝四路大军的覆没，姜弘立率部向后金投降。此后，朝鲜不敢再派军队直接参战，但是却仍然在道义和物资上支持明朝的战争，接纳辽东难民以及后金境内不堪忍受残暴统治的逃人。天命七年（1622），朝鲜又允许明总兵毛文龙在皮岛（今朝鲜椴岛）一带建立军事基地——东江镇，给予粮草、耕地支持，伺机袭扰辽东，构成了后金的心腹之患，令其感受到如同芒刺在背的威胁。

皮岛，位于西朝鲜湾北部，与辽东沿海诸岛屿脉络相通，岛上“环山峭壁”⁶，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毛文龙将总兵府设于此地，苦心经营，收揽辽民，招募士卒，整军备战，并且伺机攻取旅顺、金州等要地，与辽东沿海诸岛屿连成一片，开辟了与后金作战的第二战场。东江之明军进可突袭辽东，退可据守岛屿，相机而动，成为了辅助辽西防御前线的重要力量。

建立东江镇后的三、四年间，毛文龙频繁向后金出击，使其在辽南的统治无法得到巩固，不得已，努尔哈赤逼令沿海居民尽数北迁，以避明军锋

4 皇太极即位后，安抚汉人，重用汉官，努力缓和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矛盾。并且模仿明制，推行改革，较好地解决了内政问题。

5 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明廷派兵援朝，取得“壬辰之役”的胜利，对李朝有“再造之惠”。因此，朝鲜更是将明朝视为父母之邦，奉行“事大”原则，对其忠心耿耿。参见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三月甲辰”条，载吴晗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04页。

6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页。

芒，弄得“盖州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里之地，彼（指后金兵）尽去之而不据”⁷。更有甚者，皮岛精锐还曾突袭至后金腹地，给其统治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五月，毛文龙遣兵进攻辽东，一度推进到距离沈阳仅180余里的鞍山驿。努尔哈赤当时刚从蒙古战场回师，途中闻讯，大为惊骇，一面统率大军急行，乘夜进入沈阳，一面命诸贝勒带领所部人马，俱往鞍山应援。直到后来听说毛文龙已然兵败，人心稍定，才停止进军，班师回朝。由此可见，毛文龙驻皮岛期间，屡次袭扰后金统治区，配合辽西正面战场，有效地发挥了侧翼牵制的作用，后来东江镇还配备了红夷大炮，力量更为强大。正如《明季北略》一书所言：“文龙居岛，联络朝鲜，招携辽庶，时以游兵出没海外，牵制东师（指后金兵），使不得深入山海，敌人患之。”⁸随着毛文龙势力的壮大，后金对朝鲜也愤恨不已，所谓“奴酋之恨臣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⁹。

2. 西面隐患

后金的西面是明朝重要的拉拢对象漠南蒙古。大体而言，明中叶以后，以沙漠瀚海为限割，蒙古逐渐分为三大部分：南部为漠南蒙古；北部称漠北蒙古；西部称漠西蒙古。由于漠南蒙古与明、后金两大政权接壤，因此它的向背对于战争全局的影响至关重要。就当时情况而言，草原上最为强大的部落莫过于“土马强盛，横行漠南”¹⁰的察哈尔部，其首领林丹汗为成吉思汗嫡系子孙，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¹¹，扬言“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¹²，声势烜赫。

7 谈迁：《国榷》卷85，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225页。

8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安州之战》，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9 《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第710页。

10 魏源：《圣武记》卷3“外藩”，《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6页。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皇帝第3函，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9页。

12 汪楫：《崇禎长编》卷11“崇禎元年七月己巳”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

自辽东战事起，明朝便注意到了漠南蒙古这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尤其是林丹汗麾下精锐的蒙古铁骑。在当时，林丹汗驻营广宁以北，曾屡次抄掠明朝边界，希望与中原通贡互市。明朝为了拉拢林丹汗，改变了对察哈尔部的经济封锁政策，恢复与林丹汗的贸易，并且不断增加赏赐的数额。万历四十七年（1619）朝廷给察哈尔部赏银为4000两，泰昌元年（1620）加赏至40000两，崇祯二年（1627）又加赏至81000两¹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名目的赏赐。同时，明人也认识到，“西虏（指蒙古）以憨（指察哈尔部）为主，憨之顺逆西虏所视为向背，亦东夷（指后金）所视为重轻，故讲赏惟憨之费巨”¹⁴，即重点笼络察哈尔部。明朝采取“以西虏制东夷”之策，意图通过林丹汗，联合蒙古，制衡后金。林丹汗一方面需要明朝的抚赏发展经济，一方面也考虑到后金的壮大与己不利，因此表示愿意与明朝合作，双方结成了军事同盟。

随着后金势力的逐渐强大，其与林丹汗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摩擦。天命四年（1619）铁岭之战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内中自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青吉思汗”，而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诸申之主”¹⁵，其骄横狂妄不可一世。林丹汗在信中要求努尔哈赤放缓对明朝的进攻，尤其不能进攻广宁，因为这一带是林丹汗的势力范围，广宁是他与明朝互市的重镇，倘若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将直接触犯察哈尔部的利益。努尔哈赤看到来信后，于次年正月回复，严词拒绝了林丹汗的要求，表示并不惧怕蒙古的军事威胁。林丹汗接到回信后大怒，扣留了后金派来的使者，双方矛盾一触即发。两年之后，即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明广宁巡抚王化贞制定大举进攻、规复辽沈的方略，曾与察哈尔部联络，林丹汗同意届时出兵支援明军。然而由于八旗兵行动过于迅速，林丹汗实际并未参战，明军还没来得

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617页。

13 张廷玉等：《明史》卷327《鞬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92-8493页。

14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载《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皇帝第2函，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121页。

及发起对辽东的进攻，广宁就已落入后金之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与用兵辽东期间，逐步将其影响力渗透进蒙古草原。他采取拉打结合、恩威并施的政治手腕，先后与科尔沁部、内喀尔喀诸部结盟，分化、瓦解漠南蒙古，孤立察哈尔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林丹汗毕竟势力强盛，不容小觑，所以终天命一朝，后金始终未能与察哈尔部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皇太极即位后，明蓟辽督师袁崇焕更是加大了笼络察哈尔部的力度。因此，林丹汗游弋于西，形成对后金潜在的隐患。

3. 南面威胁

后金的南面直接面对的便是大明王朝，两国在辽西前线对峙。广宁失陷后，明熹宗起用孙承宗为蓟辽督师，总理战守事宜。他与时任宁前兵备金事的袁崇焕一道，积极作为，改变了先前明军一味出城野战的策略，采取“凭坚城，用大炮”的新型战术。所谓“凭坚城”，指的是在孙承宗的规划之下，明朝在辽西走廊建立起了一系列“坚城”，形成以宁远（今辽宁兴城市）为中心，锦州为前哨，山海关为后盾，南北共计400余里的宁锦防线。所谓“用大炮”，指的是明朝在辽西布置了从澳门输入的先进火器——红夷大炮。在孙、袁二人的经营下，边防形势焕然一新，明军的战斗力大大提升。众所周知，八旗铁骑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娴于骑射，却对火器的威力了解不够。因此，“凭坚城，用大炮”战术的应用，正使明军以己之长，击彼之短。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孙承宗离职，袁崇焕逐渐成为了明朝辽西前线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指挥下，明军于翌年取得宁远大捷，令战无不胜的八旗雄师顿兵坚城之下，努尔哈赤遭遇起兵44年以来最大的失败，竟因此郁郁而终。天聪元年（1626），新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再度大举进攻，却连败于宁远、锦州城下。此时的明军经过袁崇焕的整饬，野战能力也有所提升，后金兵不但在攻坚时占不到任何便宜，甚至在城外野战中亦无法取得优势。皇太极不禁感叹道：“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

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¹⁶可见，在“凭坚城，用大炮”作战方针的指导下，辽西明军非复吴下阿蒙，不再是那支连战连溃的狼狽之师，其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八旗铁骑的进攻。自此以后，后金（清）军为宁锦防线阻隔，从战略进攻的巅峰跌落下来，明清（后金）两国在辽西一带长期相持达十余年之久，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雄心勃勃，甚至一度“以五年复辽成功自许”¹⁷。当然，此时的明朝尚未有发起反攻的能力，但是后金国小民寡，倘若长期不能南下，与地大物博的明朝拼没有胜利的消耗，最终必然自困，甚至土崩瓦解。因此，后金国的南面同样感受到来自明朝的强大压力。

皇太极曾就其即位初期后金面临的严峻外部形势作过一番描述：“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于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¹⁸诚如是，后金面对明朝及其同盟的三面包围，且连遭宁远、宁锦之败，南下攻势严重受阻。在这种形势下，努尔哈赤专意攻明、割据称雄的战略变得不合时宜，皇太极的“伐大树”军事思想就此应运而生。

二、“伐大树”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内涵

通过梳理史料可知，“伐大树”的军事思想并非皇太极的发明，其渊源于乃父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得出的重要军事论断。明朝末年，在女真地区最强大的势力莫过于海西女真（即叶赫、乌拉、哈达、辉发扈伦四部）。从万历十一年（1584）起兵至三十五年（1607），努尔哈赤先后完成了建州女真、长白山女真的统一，兼并了海西女真中的哈达、辉发两部，他便把主要的用兵方向对准了扈伦四部中最为强盛的乌拉、叶赫部。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进攻乌拉，于河岸扎营。随征的代善、皇太极请求过河攻打乌拉部

16 《清太宗实录》卷3“天聪元年五月癸巳”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48页。

17 汪辑：《崇祯长编》卷11“崇祯元年七月癸酉”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623页。

18 《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六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23页。

的都城，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汝等出言毋若浮面取水之易也，须探其底里耳。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且将所属城郭尽削平之，独存其都城，如此则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¹⁹也就是说，对于强大的势力不急于速战，要通过不断的打击消耗其有生力量，待其奄奄待毙时再一举灭之，如此既可取胜，又可减少己部伤亡。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努尔哈赤的军事韬略。故而，他先后发动宜罕阿麟城之战和乌拉河之战，斩其人，克其城，俘其众，焚其粮，却始终没有一鼓作气将其消灭。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再次领军征伐乌拉，强盛一时的乌拉部，经过多年打击，早已衰落不堪，毫无招架之力，努尔哈赤大军势如破竹，很快便克取都城，将其灭亡。此后，努尔哈赤集中力量攻打叶赫部，他同样不急于求成，持续派兵攻略叶赫城池，消耗其有生力量。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第四年，即天命四年（1619），八旗铁骑终于灭亡了强大的叶赫部。至此，努尔哈赤攻取扈伦四部之地，基本完成了统一女真的大业。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此时后金已经从女真地区发展到辽东平原，其面对的敌人，也不再是边陲之地的女真部族，而是抚有中原，立国200余年的大明王朝。对于后金而言，这是一个更为强劲的对手。

后金与明朝在综合实力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其一，后金军队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明朝。八旗兵发动进攻，主要依靠弓马骑射，以楸车阻挡明军炮火，架设云梯攻城。然而，天启末年明朝从澳门输入红夷大炮，布置于宁锦防线，成为了此后辽军守城的重要利器。其威力大，射程远，精度高，“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²⁰，时人盛赞这种大炮，认为“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²¹八旗铁骑的猛烈攻击

1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载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27页。

20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袁崇焕守宁远》，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21 李之藻：《李我存集》卷1，载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83，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324页。

便在红夷大炮火力的压制下不得施展，宁远、宁锦两度失败，“士卒阵亡甚众”²²，将士尸体“填塞满道”²³；其二，明军长于守城，而八旗铁骑不利于攻坚，因此其在攻城略地时往往处于劣势，有后金官员指出：“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死守，我国每每弗下。”²⁴皇太极也认为：“数年来我之军士皆怯于攻城。”²⁵宁远、宁锦之战后金的失败便是一个明证；其三，最为关键的是，后金的国力远不能与明朝相提并论。此时的后金仅有效控制辽河以东的疆土，地窄人稀，遭到连年战争与自然灾害的打击，且为明、朝两国封锁，无法展开互市贸易，故而财用严重不足。另外，努尔哈赤晚年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造成国内的主要劳动力——汉人纷纷逃亡和反抗。因此，后金的经济一度崩溃，天聪元年（1626），“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²⁶反观明朝，虽然国势已衰，但其拥有中原广阔的腹地，“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²⁷后金汉官宁完我认为：“他家（指明朝）天下二三十年，他家疆域横亘万里，他家财赋不可计数。”²⁸关于明金双方的国力差距，兵员数量的对比更为直观。据史料记载，天命六年（1621）闰二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1函，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55页。

23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载《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1页。

24 《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天聪二年奏本”，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第48页。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3函，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50页。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1函，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57页。

27 《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天聪二年奏本”，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第48页。

28 《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载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月，八旗共有230个整牛录以及2个半牛录²⁹，即使按“三百人为一牛录”³⁰的原则计算，亦不过69000余人。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其兵员数量有所增加，但终天命之世，努尔哈赤在战场上投入的兵力均远逊于10万人。³¹反观明朝，宁锦之战前明廷在关内外便集结了15万大军。³²差距悬殊，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明非速亡之国，后金亦非速胜之邦，明强金弱的总体格局，在较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辽事初期，后金凭借八旗铁骑凌厉的攻势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其在对明战争中的劣势尚不明显。天聪初年，国家处于“四境逼处”的窘境，尤其是八旗军在宁远、宁锦遭到两度失败之后，明金两国的巨大差距便彻底暴露出来。皇太极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对明方略上力主持重，稳扎稳打，绝不轻率冒进。³³在天聪年间，他认为后金的国力尚不强大，遂积极与明朝谋求议和，甚至不惜自降规格，其目的便是麻痹敌人，争取时间发展自身。然而，明朝君臣死守天朝上国的面子，并以历史上宋金议和为鉴，坚决不和皇太极展开深入谈判。因此，皇太极的这一谋略最终未能成功。但是，后金不断发出和平意愿，便将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明朝，在舆论和道义上占据了主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伐明的阻力。正如《清史稿》所载：“伐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皇帝第3函，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70-171页。

3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辛丑年正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46页。然而，根据李洵、赵德贵等点校：《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的相关记载，有清一代，八旗各牛录的人数实际低于300人。

31 参见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59、158-159页。

3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载《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9-420页。

33 在这一问题上，皇太极也曾产生过动摇。天聪三年（1629），后金发动“己巳之役”，首次绕道蒙古进入中原。在班师之际，皇太极命令军队驻守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试图将其作为插在关内的楔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明朝辽兵出动，很快便收复了这些失地，后金守军被迫狼狽溃逃。这一事件令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明朝在中原统治力尚强，且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后金难以在内地立足。从此以后，他不再急躁，虽屡次派兵入边作战，却再也不占据关内城池，完全以掳掠、骚扰为军事目的。

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深入，可以得志。”³⁴

然而，皇太极的这番深谋远虑却不为国内一些臣工理解，尤其是汉官往往鼓动他大举攻明，早成鸿业，提出了诸如直取北京、航海攻登州、进克山海关等具体方案。皇太极对此不以为然，在天聪七年（1633）十月指出：“尔汉启心郎、生员等，动辄以航海取山东、攻山海关为言。夫航海至危之事，而我国又不善操舟。至于山海关素号险固，未易攻取。此岂非欲航海者咸没于水，欲攻险者致损其兵乎！我国方承天眷，甫集之兵民无几，若少亏损，何以克成大业。为此说者，是为敌人而损我兵，徒以空言相赚耳！此等疏奏何益之有！”³⁵两年后，皇太极又告诫汉官：“至谓朕宜速出师以成大业，此亦不达时势之见。夫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但图大事亦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皆新来归附，降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其何以克成大业？……若人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今以速出师为言者，乃小人之浅见。朕度其意，不过欲劳师旅，克城池，冀得财货以偿一己之勤劳，而军国之艰难，竟置之膜外也。”³⁶本质而言，汉官对征明所面临的严峻困难估计不足，与皇太极的主张产生了较大分歧。³⁷

崇德年间，随着清朝的国势趋于强盛，又不断有官员向皇太极进献攻取北京的计策，尤其是松锦之战以后，这种呼声更大。崇德七年（1642），以

34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太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9页。另据陈生玺：《论松锦之战后的明清议和》，《渤海学刊》1989年第3期，皇太极采取议和策略还有希望向明朝索取岁币，恢复贸易，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目的。

35 《清太宗实录》卷16“天聪七年十月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13页。

36 《清太宗实录》卷22“天聪九年二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93页。

37 皇太极不认同速攻明朝的主张，除了战略考量外，还基于两点原因：其一，许多亲贵观念落后，缺乏政治抱负，执迷于“抢西边”；其二，皇太极担忧满洲入关后将渐染汉俗，重蹈金朝覆辙，难以长治久安。因此，他在位期间不急于匆忙入关，一方面引导八旗贵族树立进取中原的信念，一方面以“参汉酌金”为原则，整顿内部，改革政治制度。参见吴刚：《“抢西边”和“欲得中原”——“己巳之役”中满洲贵族新旧“战争理念”的碰撞和冲突》，《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77-280页。

佟图赖、祖泽润、祖可法、张存仁等汉官为代表，联名奏请“因天时，顺人事，大兵前行，炮火继后，直抵燕京而攻破之”。然而，皇太极仍坚持时机未到，否决了他们的意见，为了统一思想，他借此说出了自己的战略主张：“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³⁸这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伐大树”军事思想。皇太极将明朝这样一个基础牢固，绵延二百余年的大国比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清朝作为伐树人，是无法一斧子将其砍倒的。可行的办法，便是从大树的两旁斫削，到了一定程度，大树便会自行扑倒。这一战略的中心思想便是清朝在与明争战的过程中，不可操之过急，必须耐下性子，稳扎稳打，徐图渐进，不断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加强自身建设，待到时间成熟，便可取得成功。

三十年前，皇太极随军进攻扈伦女真乌拉部，聆听了其父努尔哈赤的那番“伐大木”论断，三十年后，已经身为大清皇帝的他又向朝臣们阐述了“伐大树”的军事思想。皇太极正是继承并发展了乃父战略，将统一女真之策运用到了对明战争中。虽然说皇太极在其晚年才提出这一思想，但是梳理天聪、崇德年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可知他早已在实践中致力于砍伐明朝这棵“参天大树”。

三、“伐大树”的军事实践

皇太极在“伐大树”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军事实践活动，以其称帝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天聪年间（1627-1636），皇太极致力于解除后顾之忧，主要表现为后金（清）征伐朝鲜、攻取皮岛、统一漠南蒙古等战役；第二阶段指的是崇德年间（1636-1643），皇太极致力于打击明朝，主要表现在清军数次入关袭扰中原腹地的战役。

38 《清太宗实录》卷62“崇德七年九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853页。

1. 第一阶段：解除后顾之忧

针对后金严峻的外部环境，皇太极决定先解决朝鲜和蒙古问题，摆脱后金面临的“四境逼处”险境，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再集中全部精力，与明朝争衡天下。因此，他继位伊始，便将兵锋指向了后金的东面邻国朝鲜。天聪元年（1627）正月，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统兵征朝，占平壤城，渡大同江，于三月胁迫朝鲜国王李倭与其签订《江都之约》、《平壤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然而，朝鲜在八旗兵撤离后并未积极履行条约，且向后金公开声称“敝邦之于明朝，君臣分义甚重，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毙，断不敢从。”³⁹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朝鲜遣使庆贺，却拒不下拜，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清廷的轻视和不满。皇太极恼羞成怒，于十二月亲率大军再征朝鲜，逼临王京（今韩国首尔），围南汉山城，次年二月迫国王李倭签订城下之盟——《南汉山规则》，两国约为“君臣之国”。至此，朝鲜断绝与明关系，转为清朝的藩属，并承担朝贺、进贡、从征等一系列义务，被迫参与清对明的战争。

在二次征朝的过程中，皇太极还分兵解决了困扰清（后金）政权达十余年之久的皮岛问题。事情还需追溯至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这一年，明东江总兵毛文龙被时任薊辽督师的袁崇焕所杀，从此以后，东江“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⁴⁰。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岛上诸将矛盾激化，内斗不止，元气大伤。甚至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因遭到排挤和迫害，先后于天聪七年（1633）、八年（1634）率部携岛投降后金。经过几番内讧，东江镇势力大为削弱。崇德二年（1637），清军挟征服朝鲜之威，航海转攻皮岛，一举克之。至此，皇太极完全解决了来自清朝东面的隐患，明朝在辽东沿海及朝鲜的影响力彻底终结。

除了东部用兵之外，皇太极也积极经营西部，使漠南地区臣服大清。据

39 《清太宗实录》卷13“天聪七年二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83页。

40 张廷玉等：《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718页。

史籍记载，林丹汗身为蒙古共主，虽颇有作为，但生性残忍贪婪，穷奢极欲，有“宋康武乙之暴”⁴¹。他兴兵攻略诸部，大肆屠杀掠夺，迫使民众四散奔逃。对于一些归附的部落，林丹汗也是采取残暴的统治，甚至无端以低价掠取其他首领的财物，可谓予取予求。在这种情况下，漠南蒙古各部与察哈尔部离心离德，林丹汗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皇太极继位后，便利用这一形势，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吸纳敖汉、奈曼、扎鲁特、喀喇沁等部相继归顺，逐渐形成了在后金领导下反对林丹汗的军事同盟。

有鉴于此，皇太极将八旗兵与归附后金的外藩蒙古兵组成联军，分别于天聪二年（1628）、六年（1632）、九年（1635）三征察哈尔，屡战屡胜。面对蒙古的叛离和后金的威逼，林丹汗不断西逃，最终死于大草滩（今甘肃民乐县永固镇一带）⁴²，其子额哲率部众投降。至此，察哈尔势力崩溃，皇太极取代林丹汗成为了漠南草原的新主人。这一事件，标志着明朝“联西虏制东夷”策略的破产，来自后金西面的威胁得到了彻底解决。

经过多年的东征西讨，皇太极终于结束了继位初期后金政权“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唯一的劲敌明朝。天聪八年（1634）十月，皇太极在其父努尔哈赤的灵前祭告：

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附者半。后察哈尔汗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指西藏），殁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⁴³

2. 第二阶段：全力打击明朝

宁远、锦州城下的两次失利，让皇太极认识到：“彼山海关、锦州防守

41 魏源：《圣武记》卷3“外藩”，《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6页。

42 达力扎布：《察哈尔林丹汗病逝之“大草滩”考》，《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

43 《清太宗实录》卷20“天聪八年十月庚戌”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72页。

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他不愿与明军在辽西一带僵持，决定开辟新的战场，提出：“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⁴⁴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明朝在边境的主要力量都集中于山海关及宁、锦一线，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⁴⁵，易于攻取。皇太极的新战略便是避实就虚、千里纵兵、迂回作战，绕道蒙古，从长城薄弱处进攻中原。这类军事行动，不在占城夺地，重在削弱明朝势力。基于此，后金（清）军先后五次入关袭扰，往往绕北京而不攻，略城池而不守，却给关内地区带来了灾难。其中天聪年间发生两次，主要活动于京畿、山西一带，含有试探意味，规模相对较小。⁴⁶崇德以后，随着清朝国势日隆，解除了东、西两面的后顾之忧，皇太极开始集中所有力量与明朝抗衡。因此，崇德年间的三次入关袭扰，规模不断扩大，清军得以深入中原腹地，给明朝的北方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

崇德元年（1636）五月三十日，皇太极刚登上皇帝宝座一个月，便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攻打明朝。七月初七日，大军入居庸关，略昌平，焚天寿山德陵，绕过北京，袭击良乡，攻克宝坻、定兴、房山、涿州等地，“遍蹂畿内，攻略城堡”⁴⁷，此役清军“克十二城，败敌五十六次”⁴⁸。八月三十日，阿济格奔冷口东归，于九月二十八日返抵沈阳。清军此次伐明，历时4个月，长驱直入，纵兵于明朝的京畿腹地，甚至推进到历代明帝陵寝所在地的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给中原人士带来了巨大震荡。

崇德三年（1638）八月，皇太极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率左翼军；以贝勒岳托为扬威大将军，统率右翼军，分两路伐明。大军分别从墙子岭、董家口入边，会合于通州河西，绕过北京，抵达涿州，然后分兵八

44 《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91页。

4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87页。

46 即天聪三年（1629）的“己巳之役”以及天聪八年（1634）的“入口之战”。

4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96页。

4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15函，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76页。

路：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其他六路布列在太行山与运河之间，由北向南，长驱并进。八旗铁骑驰骋在华北平原之上，所向披靡，沿途所过皆遭攻掠。十二月，清军阵斩明督师卢象升，明军全面崩溃，勤王之师聚集，却观望不敢战，清军得以驰骋京畿，连陷昌平、宝坻、平谷等城。

翌年正月，清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山东。八旗兵从临清州、东昌等处渡过运河，分兵两路，一趋高唐、一趋济宁，会合于中原重镇济南城下。济南城此时防卫空虚，清军乘势攻陷，俘德王朱由枢，杀巡按御史宋学朱、布政使张秉文等明朝官员。离开济南后，清军继续长驱直入，攻兖州、沧州、青州等城邑，三月经迁安县，出青山关班师，四月回到沈阳。

清军第四次入关，历时5个月，“转掠二千里”⁴⁹，活动范围深入河北、山东，“所至之地，纵横无敌”⁵⁰，取得重大战果：两路共败明57阵，克山东济南府并3州、55县、2关，杀明宗室、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共百余人，生擒德王朱由枢、监军太监冯允升等人。

崇德七年（1642），清军取得了松锦大战的胜利，明、清强弱态势发生逆转，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仍不敢掉以轻心，他没有听从汉官直取北京的建议，依然采取稳妥之策，调遣军队深入中原腹地，继续耐心地砍伐明朝这棵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树”。十月十四日，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伐明，分两翼进兵，一路从界岭口毁边墙而入，一路从雁门关的黄崖口攻入长城，两路大军会师于蓟州，乘胜往掠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河间、香河等地。闰十一月，清军从畿南进入山东，二十五日，自临清分五路进兵，驰骋齐鲁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十二月初八日，清军攻破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接着，清军分兵连下泰安、青州、武城等地。崇德八年（1643）四月，清军北归，折道京畿，五月初一日破关出边，至六月回到沈阳。

4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04页。

50 《清太宗实录》卷46“崇德四年四月辛丑”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608页。

清军的这一次入关袭扰，历时8个月，击败明军39处，攻克兖州、顺德（今河北邢台市）、河间3府，18州，67县，共计88座城市，归顺的有6座城市，擒斩明鲁王朱以派和乐陵、阳信、东原、安邱、滋阳5位郡王，以及宗室文武等官凡数千人。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去世，这场战役遂成为他一生中明朝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四、“伐大树”军事思想的重要价值

“伐大树”的要旨，在于徐图渐进，需要从加强自身和削弱敌人两方面努力，不断缩小敌我之间的差距，最终取得胜利。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皇太极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明清易代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一，清对明朝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通过两征朝鲜、三征林丹汗、用兵皮岛等军事行动，清朝砍掉了明朝的“左膀”、“右臂”，结束“四境逼处”的窘境，反而对明朝形成了包围态势，改变了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朝鲜的宾服，使清朝获得了第一个藩属国，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而明朝“天朝上国”的地位则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以后，虽然朝鲜并不愿意，却也不得不服从皇太极的诏命，派出军队参加伐明战争；蒙古的归顺，更是与明清战局的走向密切相关。从此以后，明朝北面屏障洞开，清军得以屡次绕道蒙古，进入中原，攻城略地，俘虏人畜，加速了明朝的衰亡。正如《明史·鞑靼传》所言：“明未亡，而插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⁵¹

其二，清朝袭扰中原的军事行动，严重削弱了明朝的有生力量。明朝的京畿及冀鲁地区遭到清军的反复洗劫，损失惨重，城郭残破，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这一地区作为中原的核心区域，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明朝国势则日渐衰微。据史书记载：崇德年间清军三次入关，元年（1636），“共

51 张廷玉等：《明史》卷327《鞑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94页。

俘获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⁵²；三年（1638），“俘获人畜计四十六万二千三百有奇”⁵³；七年（1642），“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⁵⁴。据谢晋芳考证，“五次总计北掳人口在95万人左右；人畜总数可约达200余万。”⁵⁵此外，八旗兵深入中原腹地，还造成汉民的大量死亡，据沈一民推测，华北地区因清朝掳掠而导致的死亡人口达200万。⁵⁶明的损失，真可谓创巨痛深！甚至可以认为，皇太极的军事行动给予华北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后来李自成、大顺军迅速攻克北京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⁵⁷

其三，清朝在对明征战的过程中促进了自身军事技术变革的发展。宁远、宁锦之战后，皇太极充分认识到了红夷大炮这种先进武器的威力。因此，他在天聪三年（1629）“己巳之役”中，特意俘虏了明朝方面熟悉制炮、用炮技术的工匠和官员，让他们为后金铸造火炮。五年（1631）正月，汉人佟养性、丁启明等铸成“天佑助威大将军”⁵⁸炮，标志着后金初步掌握了造炮技术。七年（1633），在后金与东江镇明军对峙期间，孔有德、耿仲明因遭到内部排挤，统率曾受葡萄牙军事顾问完整西式火炮训练的3600名军士向皇太极投降，他们不仅携带了包括10余门红夷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而且还把葡萄牙人所传授的、一般明军都不曾完整掌握的铸炮、操炮之法外传，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后金军事科技的发展，冲击了明朝的“凭坚城，用大炮”

5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15函，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96页。

53 《清太宗实录》卷46“崇德四年五月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613页。

54 《清太宗实录》卷64“崇德八年五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889页。

55 谢景芳：《明末皇太极北掳中原人口考实》，《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6 沈一民：《试论1644年前明清战争对华北人口的影响》，载《明长陵营建6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57 有学者将明之亡完全归功于李自成、大顺军最后攻破北京，笔者以为皇太极的“伐大树”军事行动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不容低估，明朝实亡于两线作战。参见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58 《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09页。

战术。⁵⁹正如清将佟养性所说：“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⁶⁰清朝逐渐在火器上取得优势，成为攻打坚城的重要法宝。

其四，皇太极在推进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将满、蒙、汉诸民族联合，极大地增强了清朝与明朝争衡的实力。统一漠南蒙古后，皇太极在草原上推广盟旗制，又编设八旗蒙古，进行军事化的统治。从此以后，蒙古铁骑成为满洲人证明的重要同盟军，驰骋疆场，为清朝的统一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此外，皇太极又以俘获、归顺的明朝将卒为主体，创建八旗汉军。满洲与蒙古军队以骑兵为主，擅长野战冲锋；汉军则以步兵、工兵与炮兵为主，负责围困、凿城、操炮、挖壕。随着八旗中满、蒙、汉三大系统的基本形成，清军也由骑兵单兵种作战发展为骑、步、炮多兵种协同作战，进攻明朝的实力大大增强。

其五，皇太极通过战争的手段，促使清国内的经济形势走向好转。两次征朝之战，清挟胜利者之威，均要求朝鲜开市通商，并索取大量岁币或贡品，以弥补明朝关闭边界贸易带来的损失；数次入关袭扰，皇太极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掳掠财富，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正如他所说：“满洲、蒙古向以取资他国之物为生。”⁶¹战争，恰是北方民族政权积累财物的重要手段。据史书记载：崇德三年（1638），清军深入中原，掠得“金四千三十九两，银九十七万七千四百六两”⁶²；七年（1643），“获黄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四匹”等等。⁶³此外，清军在中原俘虏的大量汉民，又成为

59 参见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60 《佟养性谨陈未议奏》，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载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页。

61 《清太宗实录》卷15“天聪七年九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08页。

62 《清太宗实录》卷45“崇德四年三月丙寅”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602页。

63 《清太宗实录》卷64“崇德八年五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889页。

了辽东地区进行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通过这些方式，再加上皇太极的一系列重农政策，清朝的经济形势走向好转。

其六，清军数次进入中原腹地，瓦解了明朝的军心民心。每当清军大举入关，明朝方面往往是勤王之师云集，却只作壁上观，畏敌如虎，不敢出战，致使八旗军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崇德元年（1637）八月三十日，阿济格在掳掠京畿4个月后，率军东归，明朝的督师张凤翼、总督梁廷栋得到消息，只是在背后尾随清军，却不敢接战。九月初一日，清军携带大量战利品出建昌冷口，命所掠子女“皆艳装乘骑，奏乐凯归”。此外，他们还砍下木头，写上“各官免送”四字，以此嘲讽明朝将吏的不作为。⁶⁴崇德八年（1643）四月，清军依然是在饱掠之后北归，折道京畿，督师大学士周延儒统领大军，却怯懦不敢战，他驻于通州，只是和幕下宾客饮酒娱乐，每天写章奏报捷，思宗不知情，还赐玺书褒奖。五月初一日，清军破关出边，至六月回到沈阳。其时，“边城既隳，子女玉帛捆载出入如织，卒无一矢加遗也。”在这种情况下，周延儒竟然上奏朝廷，内中称：“臣中夜冒警，自顺义抵密云，趋各督抚逐战，东骑今俱出塞。”⁶⁵皇帝还被蒙在鼓里，温旨慰劳。战后事败，思宗震怒，勒令周延儒自尽。这些人的事迹，反映了当时明朝将官的普遍精神面貌。百姓眼见官军如此不中用，对朝廷十分失望，每当听到清军入关的警报传来，民众便扶老携幼躲入深山，或远走他乡，致使中原一带城郭空虚，便利了八旗铁骑的长驱直入。在清军的屡次打击之下，明朝上下已经丧失了斗志，对于敌人的蹂躏变得麻木不仁。

经过多年经营，到了皇太极晚年，明清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清朝蒸蒸日上，“器械精，粮草备，人马健，将酋勇”，明朝则饱受八旗兵和农民军的双重打击，日薄西山，“军马单，火器少，饷银无，地势孤”。有明朝官员哀叹道：“以奴之势力，在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每临阵犹势相均，力相敌也。讫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矣，抢夺马匹器械，

64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2《清兵入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9页。

6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06页。

百倍于我之马匹器械矣。掳掠丁壮兵民，又不啻十数万生聚矣。捆载辘重金帛，又不止百千万财宝矣。”⁶⁶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下定决心与明军展开关外决战。崇德五年（1640）至七年（1642），皇太极采用“围城打援”之策，击败明朝13万援辽大军，连克锦州、松山（今辽宁凌海市松山镇）、杏山（今辽宁凌海市杏山乡）、塔山（今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清朝的参战部队⁶⁷，除了满洲兵、蒙古兵、汉军外，还有受召而来的朝鲜炮兵，他们偕同作战，共同打击明军。而红夷大炮，更是在战场上大展神威，对清军攻取塔山、杏山二城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总之，松锦大战的胜利，反映皇太极“伐大树”的军事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后，清军打破了十几年来辽西僵局，重新在关外转入战略进攻，而明朝则损失惨重，坚固的宁锦防线走向崩溃，清朝入主中原的基础就此奠定，所谓“式廓皇图，永定帝业”⁶⁸。

余 论

“伐大树”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反映了清（后金）统治者政治抱负和观念的转变，即由努尔哈赤时期满足于割据辽东称雄，转变为皇太极的立志进取中原。

天命七年（1622），后金军占领广宁，明朝在辽西地区的统治全面崩溃，广宁周围的闾阳驿（今辽宁北镇市闾阳镇）、小凌河（今辽宁凌海市）、松山、杏山、盘山驿（今辽宁北镇市盘蛇驿村）等40余城堡的明军守城将官均降附后金，山海关即在眼前。然而，努尔哈赤却没有乘胜进取，只是加以抢掠焚毁，便下令撤兵。皇太极执政后曾论及此事：“我师既克广宁，诸贝

66 《明清史料》乙编第5本，“兵部题〈御前发下辽东巡抚黎玉田题〉残稿”，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第494页。

67 此战清朝投入倾国之兵，稍多于明军兵数13万。相比于努尔哈赤时代，清朝的兵员有了明显扩充。参见孙文良、李治亭：《论明与清松锦决战》，《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68 颉琰：《太宗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清武英殿刻本，第2页。

勒将帅咸请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返。”⁶⁹可见，努尔哈赤只是想据有辽东之地，并无更大的进取之心。⁷⁰正因为如此，天命年间的后金政权在取得辽沈后，便没有形成一套系统性的伐明战略。

皇太极即位后，胸怀大志，逐步确立了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军事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清（后金）强弱态势改观，他的信念愈发强烈。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虽然否决了汉官大举攻明之议，但却指出：“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⁷¹表明他是愿意成就“大业”的。同时，皇太极还询问大臣：“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厘念者也。”⁷²可见他已经在考虑未来八旗兵入关后的具体方略了。崇德七年（1642），清军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俘获明朝辽总督洪承畴。皇太极将其劝降，优加款待。八旗将领不理解皇帝的作法，心生不满：“洪承畴一羈囚，上何待之重也？”皇太极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诸将表示：“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着说：“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⁷³由此可见，“得中原”逐渐成为皇太极君臣及八旗诸将的共同目标。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皇太极在实践中形成了“伐大树”军事思想，作为宏观层面与明朝大国争锋

69 《清太宗实录》卷3“天聪元年四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42页。

70 努尔哈赤的主张是将辽西地区作为军事缓冲带，后金占有辽东土地，而明朝统治关内版图，两国互不干涉，各自独立。

71 《清太宗实录》卷22“天聪九年二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93页。

72 《清太宗实录》卷22“天聪九年二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93-294页。

73 昭梿：《啸亭杂录》卷1《用洪文襄》，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

的指导性战略。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大顺军攻入北京，明朝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终于“自扑”。清军在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协助下顺利进关，击败李自成，世祖定鼎北京，开启了清朝统治全国的新纪元。造成这一历史大变局的原因有很多，但皇太极“伐大树”军事思想及其实践，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